

印度知识分子的现代性探索历程

——基于印度英语小说的研究

闫紫薇

摘要：印度的现代性始于殖民主义，西方现代性以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知识体系的方式渗透进印度的日常经验，而印度本土经验则被斥为“非现代的”。首先主张反对现代性殖民主导话语的是印度知识分子，他们对印度现代性的建构立足于对西方思想进行解构、改写并重构，力图摆脱西方的现代性，剥离现代性的殖民特性，使其成为本土意识形态，指向普遍的进步。作为印度知识分子的一员，印度英语文学家及其笔下的文学作品共同扮演着社会良心的角色，以公理代言人的身份为民众发出呐喊。借助彼得·瓦格纳对于第三世界的现代性研究，可以从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与认知现代性三个维度描摹印度的现代性状况。面对政治现代性的重重挑战，印度知识分子辩证地看待与民主制度互为支撑的“自由”观念，在寻求最大限度上实现个人自由的同时维护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印度英语文学家更是独具慧眼地以历史现实中的知识分子为切入点，呈现其历史困境。印度的经济现代性与政治现代性相互交织在一起，市场竞争和资源分配不均使得贫富差距扩大，政治现代性强调的民主实践受到重重阻碍。文学界的知识分子同样审视与批判金钱至上价值观、人的异化、贫富悬殊等印度经济现代性建构中出现的问题。对于印度认知现代性上所面临的危机，印度英语文学家以小说创作的形式，加入了对宗教认知与现代性理性主义互动关系的探索，力图在“理性”与“宗教”之间找到一条多元、流动的“印度理性”之路。

关键词：印度知识分子；印度英语文学家；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认知现代性

收稿日期：2024—10—22

作者简介：闫紫薇（1997—），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印度英语文学、印度文学与文化等。

起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印度英语文学记录了印度现代性的发祥史。早期的印度英语文学由出身高种姓家庭、掌握英语与印度本土语言的阶层执笔，立足于“翻译”之上，以应对英国殖民者的需求。^①19世纪中期，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本土出版社的创办、英语的逐步普及等因素孕育出一批印度本土知识分子，他们把社会改革以及培养群众的政治与社会意识作为主要任务。这一时期出现了朵露·德特（Toru Dutt）、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等完全或部分使用英语创作的印度作家，他们都是发动印度社会、宗教与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洪流中的一员，他们的作品折射出印度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些知识分子不仅将反对迷信、种姓制度和嫁妆制度视为己任，更力求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印度知识分子是印度现代化的代理人，是现代性的建构者。^②他们在应对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的过程中，不仅推动了技术和经济现代化，更深层次地塑造了涉及价值观、文化认同和社会关系转型的现代性，在不断地反思与调整中促成了理性、民主和平等的价值体系的形成。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明形式，现代性于15世纪起源于西方，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赋予了它特定的含义，孟德斯鸠、伏尔泰、休谟、卢梭、康德和亚当·斯密的哲学著作彰显出启蒙运动的具体议程。^③殖民时期，英国殖民者以现代性为主导话语，宣称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以使其殖民行为合法化，于是印度的现代性探索在这种殖民主义的语境中发端。^④印度所经历的西方现代性以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知识体系的方式渗透到日常经验当中，而印度的本土经验则被斥为“非现代的”。^⑤在反对此类关于现代性的殖民主义话语的过程中，印度本土知识分子发挥了先锋作用。在近代以前，印度的知识分子群体主要由各宗教体系中的神职人员和学者构成，后随着英国殖民统治期间西方官僚制度、法律体系的引入，以及西方教育和文化体系在印度的传播，印度知识分子逐步转向从事诸如律师、文官、大学教师、新闻记者

① 黄芝：《作为“英语书写的世界文学”的印度英语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23年第2期，第46页。

② Yogendra K. Malik, “North Indian Intellectuals’ Perceptions of Their Role and Status”, *Asian Survey*, Vol. 17, No. 6, 1977, p. 567.

③ Avijit Pathak, *Indian Modernity: Contradictions, Paradoxes and Possibilities*,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p. 21.

④ *Ibid.*, p. 36.

⑤ Sujata Patel, “Colonial Modernity and Methodological Nationalism: The Structuring of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of India”, *Sociological Bulletin*, Vol. 66, No. 2, 2017, p. 127.

者和报刊编辑等世俗职业。最初的印度本土知识分子主要充当英国统治者与本地人之间的媒介，在西方和本土的知识经验体系之间徘徊调和。在去殖民化的进程中，他们逐步成为“民族资产阶级”，致力于印度民族身份的塑造^①与印度现代性的建构。

作为印度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印度英语文学家与其笔下的文学作品共同扮演着社会良心的角色，以公理代言人的身份为民众发出呐喊。自印度英语文学诞生以来，印度英语文学家便立足本土现实，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的《拉杰莫罕的妻子》（*Rajnohan's Wife*, 1864）通过融合本土文化与西方小说形式，反映了殖民时期印度社会的身份冲突与阶级矛盾。它见证了印度人在殖民统治下逐步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揭示了殖民文化对社会结构和个人身份的深刻影响。^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舍万蒂巴伊·尼坎贝（Shevantibai Nikambe）、罗梅什·琼德尔·达特（Ramesh Chunder Dutt）和戴博诃利（Lal Behari Day）等人为代表的小说家在其创作中针砭社会弊病，展现出比早期作品更强的现实意义。^③ 早在19世纪初，印度知识分子就开始构想现代印度的蓝图，试图通过现代性建构摆脱殖民统治，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建国后，如印度社会学家阿维吉特·帕塔克（Avijit Pathak）所言，尼赫鲁对于印度现代性建设项目的热情鼓舞了广大知识分子，他们进一步明确了现代性建构事业的目标，即建立一个民主的、工业化的、世俗的印度，并不断增强印度作为民族国家的力量。^④ 许多著名的印度英语文学家身兼多重社会角色：《伟大的印度小说》（*The Great Indian Novel*, 1989）的作者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同时也是一名政治家；奇坦·巴哈特（Chetan Bhagat）写出畅销书《五点人》（*Five Point Someone*, 2004）时尚未辞去投资银行家的工作；阿兰达蒂·罗伊（Arundhati Roy）不仅因布克奖获奖小说《微物之神》（*The God of Small Things*, 1997）而闻名，更作为参与人权和环境保护运动的政治活动家为人称道；阿拉文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在专职写作前曾担任《时代周刊》驻南亚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印度英语文

①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An Aesthetic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1.

② Supriya Chaudhuri, "Beginnings: Rajmohan's Wife and the Novel in India", in Ulka Anjaria, ed., *A History of the Indian Novel in Englis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31.

③ 颜治强：《论印度英语文学的起点》，《南亚研究》，2010年第4期，第140页。

④ Avijit Pathak, *Indian Modernity: Contradictions, Paradoxes and Possibilities*,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pp. 63-64.

学作品就是作为印度知识分子的作家心路历程的隐性表达。他们将在社会中的所见、所感、所思诉诸笔端，通过文学作品来构筑自己的思想体系，合力推动印度现代性的建构进程。

从现代性角度阐述印度知识分子的现有研究大多在体系上存在一定局限。它们多侧重于历史分析，尤其是殖民时期和独立初期的知识分子角色，^①而未能充分反映当代印度复杂的社会政治变迁及其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影响；或是涉及社会、历史、文学、宗教和哲学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分子，但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导致整体视角模糊，^②并且这些研究鲜有对印度英语文学家作为知识分子在现代性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深入的、成体系的探讨。德国社会政治理论家彼得·瓦格纳（Peter Wagner）立足于对欧洲、拉丁美洲与南非等国家的现代性研究，从经验和阐释的角度指明任何社会的现代性建构均围绕着三个问题：关于共同生活规则的问题，即政治问题；关于需求的满足，即经济问题；关于有效知识的问题，即认知问题。^③瓦格纳由此提出以自由（liberty）为关键词的政治现代性（political modernity），与资本主义密切相关的经济现代性（economic modernity），以及以科学和理性知识为标准的认知现代性（epistemic modernity）。^④从殖民时期到独立后，印度英语文学家在创作中不断回应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他们的作品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历史进程，还推动了印度现代性的发展建构。借助瓦格纳的框架，可以更清晰地呈现印度英语文学家如何通过其作品与实践，逐步构建出一个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性，反映出这一历史过程中的持续性、变革性和复杂性。本研究以瓦格纳关于现代性研究的三个方面为基础建构文本框架，从印度英语小说家及其创作入手，解读印度当代知识分子在现代性探索中的独特路径。

① Avijit Pathak, *Indian Modernity: Contradictions, Paradoxes and Possibilities*,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Shrutu Kapila, e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or Indi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Christopher Minkowski, Rosalind O' Hanlon and Anand Venkatkrishnan, eds., *Scholar Intellectuals in Early Modern India Discipline: Sect, Lineage and Community*,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③ Peter Wagner, *Modernity as Exper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A New Sociology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 4.

④ Ibid., pp. 14-17.

一、政治、经济、认知：印度知识分子 现代性建构的三元结构

印度近代知识分子构建印度现代性的进程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孟加拉文艺复兴时期，他们借鉴西方现代性的意涵，并将其与本土文化相调和，致力于通过教育、宗教改革、社会运动和政治参与消除传统社会中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以推动印度向现代国家的转变。梵社（Brahmo Samaj）创始人拉姆·摩罕·罗易（Ram Mohan Roy）、圣社（Arya Samaj）创始人达耶难陀·萨拉斯瓦蒂（Dayananda Saraswati）以及泰戈尔、凯舒布·钱德拉·森（Keshub Chandra Sen）等知识分子对印度教的流行习俗，如偶像崇拜和多神论、童婚、禁止寡妇再婚、种姓偏见都持有相似的批判态度。他们汲取欧洲后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提倡自由、平等与进步，希望通过吸收西方理念中的积极元素来重振印度文化的活力和竞争力，以抗衡殖民统治对印度社会造成的消极影响。19 世纪晚期的孟加拉作家兼思想家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被视为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融合的典范。^① 随着对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幻想趋于破灭，自由主义者不再受人追捧，巴尔·甘加特尔·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奥罗宾多·高士（Aurobindo Ghose）、拉拉·拉杰普特·拉伊（Lala Lajpat Rai）等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成为新的领导者，他们倾向于回归印度教传统，将《罗摩衍那》（Ramayana）、《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等印度教经典作为运动的指导纲领。

后来的国大党领袖甘地同样渴望改革，他主张复兴印度教文化，也同样关注西方思想。对甘地而言，传统并非是一个封闭的实体，他力图寻找宗教在现代世界中的可能性，思索印度文明与西方文明相遇的意义。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则认为，印度必须克服对过去的执着，步入新时代。在尼赫鲁的思想与行动中，现代印度知识分子的愿景得到了清晰的表述和实践，那便是在巩固民族国家力量的同时，使国家平稳地走上现代化发展与进步之路。然而，尼赫鲁式的知识分子们无

^① Sugata Bose and Ayesha Jalal, *Modern South Asia History, Cul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2n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 90.

法摆脱这样的困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通过西方认识印度的，像一个友好的西方人那样看待她。他们迫不及待地想改变她的面貌，给她穿上现代的服装，然而心里却产生了怀疑，他们真的了解印度吗？”^① 巴万·瓦尔马（Pavan K. Varma）在其著作《伟大的印度中产阶级》（*The Great Indian Middle Class*, 1998）中，以如下质疑表现以尼赫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复杂主体性：“为何尼赫鲁与英国殖民主义奋战一生，却要在印度独立运动取得成功之时选择英语这一不被普通印度民众理解的语言与他们分享喜悦？”瓦尔马指出，尼赫鲁既拒绝外来侵略者与统治者，又否认其祖先的存在方式，由此置自己于身份危机之中。民族主义者的身份冲突表现在“他们”和“我们”之间，而自由主义者则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摇摆不定。^② 高士在《新灯换旧灯》（*New Lamps for Old*）一文中提出的观点，或可代表广大印度知识分子在构建印度现代性过程中的主要关切：

对我们而言，即使是对于那些深深留恋过去的东方事物并相信其中有许多美丽、实用和值得保留之处的人来说，最重要的目标不可避免地仍是将西方的思想、方法和文化引入印度。即便我们雄心勃勃地要保存我们本土文明中健全且有益的部分，我们也只能通过大量地引入西方文化来实现这一点。但同时，我们完全有权坚持……引入过程不应像过去那样草率和无知，而应当是明智和有辨别力的。我们要接受西方能给我们的东西，因为西方能给我们的正是拯救我们于目前知识和道德衰退的唯一办法。^③

论及印度知识分子建构现代性的具体方面，彼得·瓦格纳立足于对西方国家以及第三世界的现代性研究，将现代性分为政治现代性、经济现代性与认知现代性三个趋向，这有助于我们全面系统地把握知识分子在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多重角色和复杂作用。2008年瓦格纳出版的《作为经验与阐释的现代性：现代性的新社会学研究》强调从解释性视角理解现代性，这些解释并非来自某种占主导地位的哲学，而

^① Jawaharlal Nehru, *The Discovery of India*, Kolkata: The Signet Press, 1946, p. 50.

^② David Kopf, *The Brahma Samaj and the Shaping of the Modern Indian Mi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88.

^③ Aurobindo Ghose, “New Lamps for Old”, *Bande Mataram: Early Political Writings- From 1890 to May 1908*, https://auromaa.org/sri-aurobindo-ru/workings/sa/01/0006_e.htm.

是来自人们在具体背景下对现代性经验作出的多种解释。^①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对于现代性的建构基于本土国情，更具经验性与实践性，因此《作为经验与阐释的现代性》一书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瓦格纳认为现代性的第一个趋向是政治现代性，并将其定义为“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自决，共同生活的准则”。^②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多社会和政治理论都假定存在一种单一的“现代社会”模式，由于其制度安排具有更高的合理性，所有社会都将逐渐向这种模式靠拢，政治现代性也被等同于一个基于选举民主和一系列基本个人权利的单一制度模式。瓦格纳根据各国的现代性实践经验，提出许多社会对政治现代性的承诺并不会明确地导致产生政体的某种制度形式。^③对印度而言，自从以甘地、尼赫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领导印度建立议会制民主政体以来，他们对于民主的政治承诺便面临着诸多挑战。种姓制度、教派冲突、社群主义价值观等都阻碍着社会的公平、稳定与团结，使得民主实践变得愈发艰难，这也意味着印度无法像西方现代性所要求的那样通过单一的政治制度实现本国的政治现代性。面对政治现代性的重重挑战，印度知识分子辩证地看待与民主制度互为支撑的“自由”观念，寻求在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自由的同时维护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确保所有公民在多元文化与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享有平等权利。

第二个趋向是经济现代性，与“市场社会”或“资本主义”密切相关。过去几十年间，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一旦走上工业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社会形态就会顺利发展——主要是指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成功完成；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称（晚期）资本主义发展是不稳定的，充满矛盾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启蒙辩证法》便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隐藏的矛盾和理性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削弱了社会实体的外部边界，导致“风险社会”下的“个体化”。^④经济现代性不可避免地产生生物化和异化，破坏了政治现代性的民主实践。印度的经济现代性在这一过程中同样与政治现代性紧密相关，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实施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之后，印度逐渐向市场导

^① Gerard Delanty, “Modernity and the Escape from Eurocentrism”, in Gerard Delanty, ed.,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ocial Theory*, Abingdon: Routledge, 2006, p. 400.

^② Peter Wagner, *Modernity as Exper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A New Sociology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 21.

^③ Ibid., p. 21.

^④ Ibid., p. 77.

向型经济靠拢，标志着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变。经济自由化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为民主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市场竞争和资源分配不均使得贫富差距扩大，技术进步和自动化为技术所有者和高技能劳动力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将无法获得相应教育资源的底层人民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种姓制度和性别歧视等传统社会问题更加剧了社会不公，政治现代性强调的民主实践受到更为严峻的挑战。经济、社会学界的印度知识分子通过发展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为经济现代性危机提供解决方案，文学界的知识分子同样审视与批判金钱至上价值观、人的异化、贫富悬殊等印度经济现代性建构中出现的问题，并在文本中设想着各类可能性，探寻可能的出路。

第三个趋向是认知现代性。17世纪的科学革命通常被认为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解放革命，它打破了怀疑主义的束缚，推动了“科学的自治”，并为认知问题提供了制度性回答。^①人们对知识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上帝不再是知识源泉和权威。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强调理性、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提倡通过理性分析和证据来获得知识。然而，当世界的表征无法用科学理性的普遍话语来回答时，另一个空间就被开辟出来。主体与世界之间，或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差距，允许甚至是邀请积极的、经验的知识来填补，以系统的、概念指导的方式进行阐述。^②瓦格纳提出确定性存在多种形式，任何在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中忽视自然中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的哲学，都是在否认其产生的条件。^③印度人的认知确定性离不开宗教哲学的影响，包括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等。这些宗教思想在印度的哲学、伦理、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深刻塑造了印度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印度人而言，这些宗教思想比西方现代性所强调的科学、理性更具确定性，可称为印度人“对于认知问题的制度性回答”。19世纪西方启蒙思想深刻影响了印度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他们开始用理性、科学的标准重新审视本土的社会宗教习俗，以罗易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倡导宗教改革，废除萨蒂制度、改善女性地位、推行教育改革，带领印度走向现代化。然而，他们同时警惕着西方的知识霸权，尝试将印度宗教知识与西方理性相结合，探寻一种印度的认知现代性。印度独立

① Peter Wagner, *Modernity as Experience and Interpretation: A New Sociology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 145.

② Ibid., p. 152.

③ John Dewey, *The Quest for Certainty*, Vol. 4,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95.

后，印度宗教与西方理性之间的平衡调和状态岌岌可危，宗教极端主义、教派冲突甚嚣尘上，以致于20世纪90年代印度教民族主义再度兴起，认知现代性面临重重危机。印度英语文学家以小说创作的形式，加入了对宗教认知与现代性理性主义互动关系的探索，并做出了独特贡献，力图在“理性”与“宗教”之间找到一条多元、流动的“印度理性”之路。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本文将运用瓦格纳的现代性三元框架探讨印度英语文学家如何借助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思考并回应印度现代性建构面临的重重挑战。本文所使用的“文学知识分子”一词，指代那些通过文学创作介入社会思考的知识分子及其在作品中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作为文学家，他们通过创作回应社会现实。他们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则成为对社会、文化与历史议题思考的重要载体。在政治现代性层面，作家们聚焦印度社会的阶级、种姓与宗教矛盾，展现出对民主、社会公正及政治参与的深切关注。在经济现代性层面，作家们通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经济转型的批判，揭示了贫富差距、人的异化以及社会不公等问题。在认知现代性层面，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人物往往在“理性”与“宗教”之间徘徊挣扎，反映出印度英语文学家对于现代科学理性与传统宗教信仰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刻思考。

二、文学知识分子与政治现代性：民主话语的建构者

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度起源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通过妥协和局部的“消极革命”赢得独立，国家因此保留了殖民者遗留的行政单位、官僚机构、法律制度和司法行政中的等级制度等。^①然而，一味地保留西方民主制度，宽泛地强调民主大众动员和成人普选，^②却不顾土地保守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共产主义等各类意识形态的纠缠拉扯^③，致使印度的民主实践面

① George J. Kunnath, *Rebels from the Mud Houses Dalit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aoist Revolution in Bihar*,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 198.

② 帕沙·查特吉著，王行坤、王原译：《政治社会的世系：后殖民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9页。

③ C. A.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Indian Thought in the Age of Liberalism and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5.

临重重困境。事实上，自19世纪60年代时起，印度知识分子所支持的宪政民主制度便带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①有学者指出，印度的民主呈现出“社群主义”的特点，更关心社会群体的命运而非个人命运，^②其深层逻辑在于，印度知识分子建构的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性始终笼罩在殖民阴影中。早期学界对于印度政治现代性的争论并不以“知识分子”本身为关键词，而多强调其党派身份^③，印度英语文学家则独具慧眼地以历史现实中的知识分子为切入点，刻画其行动背后的底层逻辑与心路历程，呈现知识分子的历史困境，并提供可能的解决办法。

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印度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建构策略是复杂且矛盾的，往往纠结于西方思想与本土文化之间，时而偏向一方，时而主张折中。他们想要跳脱这一框架，却难以找到万全之策，处于不断摸索探寻之中。用孟加拉语与英语创作的双语作家泰戈尔认识到印度教传统对底层群体的压迫，并由此反思这一传统是否成为印度构建现代性的阻碍。他的小说《家与世界》（*The Home and the World*）虽用孟加拉语创作，但其深刻的思想探索早已超越语言的界限，对印度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无疑为印度知识分子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与思考空间。《家与世界》塑造了受过教育的印度绅士尼克希尔这一形象，他的自我反思与批判象征着“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受过西方教育、思想自由、主张社会改革的孟加拉柴明达尔对印度农民生活复杂现实的矛盾看法”。^④尼克希尔的态度代表的是泰戈尔本人目睹家族庄园佃户的痛苦油然而生的内疚和焦虑。在尼克希尔的改革模式中，他虽扮演开明仁慈的柴明达尔角色，其自由主义思想却并不足以使其尝试改

① C. A.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Indian Thought in the Age of Liberalism and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6.

② *Ibid.*, p. 6.

③ 例如，印度政治学家拉吉尼·科塔里（Rajni Kothari）在其专著《印度政治》（*Politics in India*, 1970）中分析了党派在印度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探讨了如何通过党派与国家机构的互动来实现政治整合和社会变革，而知识分子的独立角色并未被作为核心议题进行讨论。类似的，比潘·钱德拉（Bipan Chandra）在《印度独立斗争》（*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1989）侧重于分析印度独立运动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及其相互作用，尤其是印度国大党和其他民族主义力量在政治斗争中的作用，知识分子更多是作为党派和社会变革的参与者而非独立的思想引领者。参见：Rajni Kothari, *Politics in India*,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0; Bipan Chandra, *India's Struggle for Independence*,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1989.

④ Sumanta Banerjee, “The Peasant in Ghare Baire”, in Saswati Sengupta, Shampa Roy and Sharmila Purakayastha, eds., *Towards Freedom: Critical Essays on Rabindranath Tagore's Ghare Baire/The Home and the World*, New Delhi: Orient Longman, 2007, p. 138.

变具有压迫性的封建土地制度。^①泰戈尔的小说道出了印度知识分子心中的疑惑，他们是否有可能利用印度传统去创造另一种现代性方案？现代性又是否只是一个精英主义计划，无法容纳印度的底层民众？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印度是否应该追求发展、生产、效率、科学等普世价值目标？^②

针对这样的疑问，甘地给出的答案是背离自由主义，同时又去除历史主义的“印度自治”。^③甘地的思想诞生于自由主义和宗教信仰的双重危机，他主张印度人不应被英国人、种姓制度和宗教制度所限制，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固定不变的，同时要接受其中的偶然性因素，预留给自己反思和改造的空间，从而在国家与社会强加的身份之外获得自由。^④然而，甘地思想中存在矛盾性与局限性，他称不可接触者为“神之子”，为他们发声，却并不主张废除种姓制度；他强调地主与农民和平相处，却在农民反抗地主的压迫时要求他们忍耐，农民便由此成为印度民族独立大业的牺牲品。甘地主张建立的现代性虽具有一定的平权意识，但实质上仍是精英主义的现代性。

这一时期的印度英语文学家大多选择在作品中与甘地思想进行对话，拉贾·拉奥（Raja Rao）的《根特浦尔》（*Kanthapura*, 1938）便塑造了穆尔蒂这样一位甘地式的知识分子。他组织村里的年轻人参与读书讨论会，去贱民区带领他们抵制外国布料，自己织布，创造工作；教贱民字母、语法和算数，向妇女儿童介绍外国政府和沉重赋税，讲述农民的贫困状况，教导他们学会爱自己的敌人。然而，村民们却心存疑虑，甘地要带领他们独立，取得自治，难道他们的国家自治后就将没有痛苦、腐败和等级吗？“只要基芬顿咖啡庄园周围还有铁门和铁丝网，只要城市的汽车能够驶上贝布尔山丘，只要有煤气灯和苦力车，就永远会有贱民和贫穷。”^⑤穆尔蒂因组织不合作运动被英殖民者逮捕，村民们虽奋力顽抗，最终却仍落得无家可归的下场。出狱后的穆尔蒂看到被毁的村庄后，丧失了对甘地的信仰，也远离了自己曾

^① Radha Chakravarty, *Novelist Tagore: Gender and Modernity in Selected Texts*, London: Routledge India, 2013, p. 102.

^② Avijit Pathak, *Indian Modernity: Contradictions, Paradoxes and Possibilities*,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p. 42.

^③ Shruti Kapila, “Self, Spencer and Swaraj: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Critiques of Liberalism, 1890-1920”, in Shruti Kapila, e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for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115.

^④ Sunil Khilnani, “Arguing Democracy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in Modern India”, *Casi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9, p. 21.

^⑤ Raja Rao, *Kanthapura*, Delhi: Hind Pocket Books Pvt. Ltd., 1967, p. 256.

一心想要团结的村民们。这是拉奥对于甘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反思：他们在倡导借鉴印度传统实现印度发展的同时，也在利用传统结构所包含的潜在号召力以服务于自身的统治目的，因此他们倡导的自由与进步话语必然是戴着枷锁的。

20世纪前半叶，受泰戈尔与甘地思想启发，尼赫鲁主张印度社会既没有自由的个人，也不存在排外的社群或民族，而是由差异堆积形成的。^①他倡导的自由主义、世俗主义与进步主义开始成为主流政治意识形态。^②尼赫鲁也未能摆脱印度知识分子的矛盾特性，他想为印度穿上“现代的服饰”，却无法确定自己是否真的了解印度，是否真能为印度寻到合适的“衣裳”。以尼赫鲁为代表的近现代印度知识分子既受过西方教育，也生活在印度传统文化的熏陶之中——家里的祖母、母亲作为印度文化传统的守护者，沉浸于印度传统信仰与习俗之中，给他们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③在双重文化的影响之下，他们的思想必然也铭刻着复杂印记。小说家 R. K. 纳拉扬 (R. K. Narayan) 的作品将这种复杂性具象化，彰显出印度知识分子对于印度现代性建构的矛盾态度。《文学学士》(*The Bachelor of Arts*, 1937) 中的主人公钱德兰从西化者转变为印度古老传统习俗的继承者，表明作家本人并不看好印度生活向现代性的推进。不过，在《萨姆帕特先生》(*Mr. Sampath*, 1949) 一书中，纳拉扬刻画的知识分子室利尼瓦斯虽谴责资本主义制度，警惕现代性的种种弊病，并选择回归宗教世界，却仍对印度传统心存诸多不满，处处站在现代的立场上抨击落后的习俗。这喻指着现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形象，同时也是从传统中走向现代的当代印度的缩影，自身也存在着矛盾性。

印度英语小说家苏丁·高斯 (Sudhin N. Ghose) 的作品《云的摇篮》(*Cradle of the Clouds*, 1951) 以印度传统习俗祈雨仪式为背景，更为鲜明地呈现出印度当代知识分子与印度现代性之间互动关系的复杂性。在城市里教书的查哈尔在学校备受尊崇，是现代化的拥护者，反对一切迷信，支持建造大坝，以改善当地供水问题。副校长标榜自己信奉的宗教是理性主义，虽然认为上天掌握着宇宙运行的规律，祈祷并不能改变什么，最终却和村民们一同出现在了祈雨仪式上。村里

① Sunil Khilnani, "Arguing Democracy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s in Modern India", *Casi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9, p. 25.

② C. A.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Indian Thought in the Age of Liberalism and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33.

③ Edward Shils, *The Intellectual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Indian Situation*, Hague: Mouton & Co., 1961, p. 350.

的梵语学者潘吉特与查哈尔持相反看法，反对建造大坝，认为这将改变村民的传统生活方式，致使其道德与精神生活瓦解。尽管潘吉特是个拥有现代知识、了解西方思想的学者，但他却极度蔑视现代事物，一心相信古老的传统。在潘吉特看来，在所谓的“进步”国家，印刷出版物越来越多，自由思想却越来越少，这些宣扬进步的西方人已经退化到了如稚子一般看图画书的状态。^①印度人唯有恪守历史传承，方可寻到绝对真理。查哈尔和潘吉特正是印度广大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的目标虽均指向印度的进步与发展，却选择了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策略。在两种策略的角力中，关于印度现代性建构的设计蓝图始终难以定型。

印度独立后致力于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等方面向现代社会转变，知识分子参与制定、修改了各类法案，如废除柴明达尔制度的法案、寡妇婚姻法、民事婚姻法以及财产继承的相关法案等，^②致力于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关系等领域建立符合现代社会规范和价值观的文化体系和社会结构。这段印度历史上较为平缓的时期实际上也是印度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型期，他们从独立运动时期的政治领袖、社会改革者和国家管理者逐渐淡出政治运动的领导层，转向公共服务领域，成为政府的技术官僚或公共知识分子。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紧急状态”来临，知识分子群体才开始以前所未有的自觉重新审视起独立以来印度的政治实践，并反思自身角色的发展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印度英语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对当时的社会以及知识分子的处境进行了思考。维克拉姆·赛斯(Vikram Seth)的《如意郎君》(*A Suitable Boy*, 1993)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作，小说以宏大的叙事和丰富的细节，描绘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独立后印度的社会全景。

《如意郎君》以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为主人公，其中税务部长马赫什·卡普尔是小说政治情节的中心人物，是废除柴明达尔法案的主要推动者，也是知识分子中的自由派理想主义者。卡普尔想要改变种姓制度，消除社会不公，却遇到党内地主精英的重重阻挠。法案的实行使得无数农民被地主驱逐，最终无家可归，这让卡普尔对国大党感到失望，于是选择辞去税务部长一职。但很快，卡普尔发现自己成了局外人，更不可能改变印度的落后现状，于是又重新以独立党人的身份参与竞选。虽然卡普尔宣扬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性价值观，

① Sudhin N. Ghose, *Cradle of the Cloud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1, p. 227.

② K. N. Panikkar, *Culture, Ideology, Hegemony: Intellectuals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in Colonial India*, London: Anthem Press, 1995, p. 89.

阶级局限性又使得他难以真正与底层民众融合，他的现代性设计也最终失败。小说中以亚伦、哈雷什、普兰、阿米特、卡比尔为代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要么加入外贸公司，要么两耳不闻窗外事，醉心于学术世界，要么一心想要加入公务员体系。这一群体身份的转变是对印度现代化项目的回应，他们选择通过商业、学术和公共服务等多样化的领域继续推动社会变革，体现了印度独立后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型与多元特质。

有学者指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印度知识分子陷入了某种“政治惰性”，这种政治倒退实际上源于“反复的挫折和失望”。^①知识分子梦想建立一个尊崇自由、民主与理性的现代国家，却发现奴役、劳动力剥削与农民贫困率在独立后的几年不断加剧。^②政府颁布的废除柴明达尔法案依然服务于地主、权贵与富人的利益。由于土改不彻底，部落民被打着保护和发展名义的政府盘剥，佃农生活在绝望之中，他们的生存依然取决于地主和放债人的安排。另一方面，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形成了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个群体，而独立后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以加入中产阶级为目的。从19世纪后期开始，由于经济萧条、工业活动减少、农业制度过时、技术教育缺乏等原因，失业的知识分子数量有所增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知识无产阶级。^③印度独立后，这一知识无产阶级群体更加依赖国家及其收入，而国家虽将大量收入投入于支付工资、养老金以及其他补贴，^④却剥夺了他们曾在民族主义运动中享有的社会和政治权力。对印度现状的失望与对自身存在的焦虑致使年轻的知识分子对政府愈加不满，这为他们加入1967年兴起的纳萨尔巴里农民运动提供了契机，也成为知识分子再次参与现代性建构的重要节点。

参与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不少领袖是教师出身，很多中层领导（尤其在马宗达领导的城市歼灭战时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⑤这些革命者以“解放印度人民”为目标，在各地开展农村游击战，并

① Maha Sallam, "Betrayal, Division, and the Ideology of Revolution in Arundhati Roy's *The God of Small Things* and Neel Mukherjee's *The Lives of Others*", *Cairo Studies in English*, Vol. 1, 2017, p. 131.

② Daniel Thorner and Alice Thorner, *Land and Labour in India*, Bombay: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62, pp. 3-8.

③ Saayan Chattopadhyay, "Recasting Men Bhadrakok Masculinities and the Gendered Voice in Bangla Newspapers since 1947", Jadavpur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2019, p. 36.

④ Sanjeeb Mukherjee, "The Use and Abuse of Democracy in West Beng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42, No. 44, 2007, p. 103.

⑤ 王晴锋：《“红色革命”与“黑色经济”：印度纳萨尔派的经济问题》，《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年第3期，第90页。

在城市中与军警发生暴力冲突。该运动迅速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①1974年，玛哈斯维塔·黛维（Mahasweta Devi）的孟加拉语小说《1084号的母亲》（*Hajar Churashir Maa*）出版，成为“纳萨尔小说”的开山鼻祖。在以纳萨尔巴里运动为主题的印度小说中，知识分子的形象始终是较为突出的。继《1084号的母亲》之后，罗希特·汉达（Rohit Handa）于1977年出版的英语小说《同志先生》（*Comrade Sahib*）以纳萨尔派知识分子为主角，之后获得布克奖提名的两部纳萨尔主题英语小说《低地》（*The Lowland*, 2013）与《他人的生活》（*The Lives of Others*, 2014）也均聚焦于参与起义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作家在小说中展现了知识分子在现代性建构中扮演的双重角色：不仅是社会变革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也是现代化过程中面临挑战和困境的主体。对于希望推动印度社会变革的纳萨尔知识分子而言，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现代性是他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愿景，然而其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却成了构建政治现代性的绊脚石。在上述多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中，作家们刻画了对农民与女性持矛盾态度的知识分子形象，深刻剖析与审视政治现代性建构进程中的知识分子。以《他人的生活》中的苏普拉蒂克为例，他在理想主义与现实冲突之间的摇摆不定，他支持纳萨尔巴里运动，倡导社会平等，但在具体实践中却忽视了农民和女性的现实困境。他与同伴们决定放弃并离开已经实施过歼灭地主计划的村庄，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会导致村民遭受警察的骚扰和虐待。与此同时，苏普拉蒂克要求母亲反抗祖母的权威，指责她无视祖母对婶婶的虐待，却未曾尝试理解过母亲作为大家庭儿媳妇的艰难处境。苏普拉蒂克的自我矛盾表明，知识分子在追求社会变革时，往往被自身阶级背景和传统父权结构所束缚。这一困境揭示了知识分子在追求社会变革与实现民主理想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深层次挑战，无疑为这一群体未来的现代性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与此同时，印度的发展也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遇到了重重问题。1973年后，印度经济、政治状况骤然恶化，旱灾导致农业受到重创，印巴战争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国内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实行教育改革，罢工、罢课、罢市蔓延全国。1974年8月，印度革命党、自由党、统一社会党、乌塔卡尔国大党和其他四个小党合并建立了印度民众党，以对抗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政权。1975年6月，阿拉哈巴德高等法院法官贾格莫汉拉尔·辛哈

^① Alpa Shah and Jain Dhruv, "Naxalbari at Its Golden Jubilee: Fifty Recent Books on the Maoist Movement in India",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51, No. 4, 2017, p. 1165.

(Jagmohanlal Sinha) 判定英·甘地违法，取消她参与竞选的权利。^① 1975年，印度总理英·甘地以“印度安全受到内部骚乱的严重威胁”为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此期间，媒体受到审查，司法程序和民主权利（如公民言论、集会、游行自由）被大规模暂停，反对派政治家大量被捕。^② 英·甘地的小儿子桑贾伊·甘地（Sanjay Gandhi）还带头发起了大规模贫民窟清理运动和强制结扎运动。紧急状态是对印度的民主制度以及知识分子一直以来构建的政治现代性的极大威胁与讽刺，然而知识分子群体却并未采取统一的抵制态度。学者苏贾塔·帕特尔（Sujata Patel）通过追溯独立以来印度社会学界的动态，发现印度社会学界很少就紧急状态进行严肃透彻的反思。^③ 与之相反，新闻界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更为坚定，合力挫败了一些专制性法案，如《反诽谤法案》和《比哈尔邦新闻法案》。^④ 同时，许多杰出的印度英语小说家选择关注紧急情况，要么作为小说主题，要么作为故事的重要背景，^⑤ 如萨尔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午夜之子》（*Midnight's Children*, 1981）、拉杰·吉尔（Raj Gill）的《火炬手》（*The Torch-Bearer*, 1983）、娜扬达拉·萨加尔（Nayantara Sahgal）的《像我们一样富有》（*Rich Like Us*, 1985）、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的《伟大的印度小说》（*The Great Indian Novel*, 1989）、罗因顿·米斯特里（Rohinton Mistry）的《微妙的平衡》（*A Fine Balance*, 1996）等。这些小说家通过作品构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反记忆（counter-memory），挖掘被淡化的罪行与腐败，挑战了英·甘地政府在紧急状态期间以“维护民主、消除贫困、造福穷人”为标志的官方说辞，^⑥ 并以或隐或现的方式揭示出由西方定义的“公民”概念不足以保护边缘群体免受现代化发展带来的侵害。

上述小说呈现了紧急状态背景下知识分子群体的异质性与分裂

① 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8页。

② Raita Merivirta, *The Emergency and the Indian English Novel: Mem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2.

③ Shiv Visvanathan, "Official Hegemony and Contesting Pluralisms", in Gustavo Lins Ribeiro and Arturo Escobar, eds., *World Anthropologies: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s within Systems of Power*, New York: Berg, 2006, p. 254.

④ Arvind Rajagopal, "The Emergency as Prehistory of the New Indian Middle Clas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5, No. 5, 2011, p. 1018.

⑤ O. P. Mathur, *Indira Gandhi and the Emergency as Viewed in the Indian Novel*, New Delhi: Swarup and Sons, 2004.

⑥ Raita Merivirta, *The Emergency and the Indian English Novel: Memory, Culture and Poli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p. 3.

性，凸显了他们构建政治现代性时不仅要应对民主政体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腐败、民粹主义、治理低效、舆论控制等问题，还要克服自身的政治惰性，不断反思、调整自我在构建印度现代性中的定位。在《像我们一样富有》中，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公务员系统中成为英·甘地腐败政府的帮凶，在压迫底层民众的政策中成为同谋。新德里来的学生们拉着赞美英·甘地的横幅，企业家赞扬紧急状态正是国家需要的，这意味着只有一个人发号施令，内阁或议会中任何人都不得对此大吵大闹，事情便可以毫无拖延地进行下去。^①曾心怀改革理想的马克思主义者卡奇鲁如今已是甘地政府的得力干将。同在公务员体系内的女主人公这样慨叹道：“曾经我们以为公务员是‘我们’，政治家是‘他们’，我们想要创造新的传统，证明自己的独立价值，如今我们这些公务员已经变成只会服从的机器人。”^②在《微妙的平衡》中，大学生马耐克看透了印度民主与发展的谎言，深感无力以至最终在绝望中选择卧轨自杀；学生领袖阿维纳什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为学生谋取权益，最终却成为被政府暗杀的民主战士。这些小说描绘了紧急状态背景下的民主困境，呼吁知识分子勇于承担责任，积极推动民主体制的完善与政治现代性的本土化重构，为印度的未来铺就一条更包容、更自主的政治发展道路。

三、文学知识分子与经济现代性： 自由资本主义的审视者

资本主义经济模式随着西方殖民者一同进入印度。实际上，印度早期的近代知识分子便是由与英国人有较多接触的商人以及与市场紧密联系的自由派地主衍生而来的。19世纪40年代早期殖民资本主义的危机导致孟加拉商业部门的衰落，^③经济形势的变化让印度人逐渐意识到发展符合本土经验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性。一群印度知识分子开始了自由个人主义形式的经济构想。梵社（Brahmo Samaj）和戴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创立的真理觉知协会（Tattvabodhini

① Nayantara Sahgal, *Rich Like U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85, p. 8.

② Ibid., p. 24.

③ C. A.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Indian Thought in the Age of Liberalism and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7.

Sabha), 强调人类的精神发展, 认为这与资本主义企业家精神中的个人角色是相容的。^① 为国家获取财富的需要与使精神与物质保持距离的要求使得《薄伽梵歌》重新成为这一群体的指导文本。20世纪初期, 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达达拜·瑙罗吉(Dadabhai Naoroji)在著作中以“财富外流论”揭露了英国对印度统治的实质, 从经济上论证了印度民族自治的必要性。^② 印度国大党领袖甘地更是主张印度的经济政策不能脱离生活的文化和精神价值。^③ 印度独立后的经济计划接受了甘地倡导的经济理念, 如建立合作社, 通过政策扶持农业、小型乡村与家庭手工业。

由此可见, 印度的经济现代性建构始终尝试结合印度的本土经验, 虽然游离于殖民(西方)资本主义之外, 但仍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特征, 并未完全摆脱西方现代性中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思维的影响, 且随着独立后印度的经济发展而逐渐暴露出种种弊端。西方“功利主义”思想“把资产阶级的个人利益、利己主义看作是人类行为的普遍的道德准则”,^④ 追求在实现个人幸福基础上的公共幸福。边沁认为, “(就整个共同体而言)当一项行动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它减小这一幸福的倾向时, 它就可以说是符合功利原理, 或简言之, 符合功利。”^⑤ 理性计算解释了个人的决定: 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快乐, 最小化痛苦。^⑥ 功利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经济理性主义”, 无疑为工业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逻辑奠定了一个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功利原则成为文化理论家解释和剖析资本主义文明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⑦ 功利主义思想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印度, 深刻影响了印度的经济现代性建构。印度独立后, 追求物质幸福和经济增长的功利主义倾向表现为政府对经济增长和物质富足的一味追求, 加剧了社会不公和阶级分化。印度政府致力于培养科技人才, 其教育政策以提高职业、技术能

① C. A.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Indian Thought in the Age of Liberalism and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7.

② 田小红:《印度近代知识分子与印度现代化》,《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3期,第94页。

③ Manjulika Kosha and Rajindar K. Koshal, “Gandhi’s Influence on Indian Economic Planning: A Critical Analysi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32, No. 3, 1973, p. 313.

④ 尹海燕:《中西方功利主义思想异同探析》,《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第97页。

⑤ Jeremy Bentham,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Kitchener: Batoche Books, 2000, p. 15.

⑥ Jimena Hurtado, “Jeremy Bentham and Gary Becker: Utilitarianism and Economic Imperial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Vol. 30, 2008, p. 335.

⑦ 萧俊明:《功利主义: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根源》,《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28—29页。

力为指导方针，背后的动机是通过科学技术发展来促进印度经济的增长。1951年8月，教育部长毛拉纳·阿布·卡拉姆·阿扎德（Maulana Abul Kalam Azad）为印度理工学院揭幕，这所学校以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由学者和企业家共同组建的委员会创立。如今，印度理工学院已成为中产阶级青年梦寐以求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是印度最难考的大学。然而，一味地追求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不仅没能促进印度各阶层的经济公平，反而使得知识分子本身产生了异化。马克思指出：“在社会发展的较早阶段，劳动和科学是互相伴随着的”，在人类较早的生产阶段“手和脑还没有相互分离”，人的劳动是同朴素且有限的经验、知识直接联系在一起的，知识并未发展成为同劳动相分离的独立力量。然而，随着人类社会步入资本主义阶段，科学研究不再是出于个人兴趣的活动，而是获得了某种新的使命：“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①资本为了实现赚钱的目的，开始积极利用科学、占有科学，并促使科学日益疏远直接劳动和直接劳动经验。科学研究俨然成为一项特殊的职业。

1977年，迫于国内外舆论压力，以及印度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英·甘地结束了国家紧急状态，恢复了民主制度。英·甘地执政期间，注重国有化改革。这些举措旨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以实现社会公平，更好地分配资源。事实上，印度一直以来采取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混合的经济模式，尽管意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但在实践中却催生了腐败和官僚主义，带来了金钱至上的社会风气，致使印度的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的成果未能惠及全体国民。1984年，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执政，印度开始实行普遍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放宽了对企业的监管和审批程序，旨在减少官僚主义，提高经济效率。经济改革的直接受益者当属中产阶级，^②因为经济自由化促进了私营企业的发展，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新的就业机会。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教育机会的增加和科技领域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技术型人才和专业人士也随之涌现。这些人才不仅支撑了印度的经济转型，同时也逐渐形成了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群体。^③拉奥政府同样表现出对科技的重视，“第二代经济改革”强调发挥像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这样的新知识产业的革命性潜力。

随着经济自由化带来的大量就业机会与高涨的收入，许多知识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70页。

② 同上，第590页。

③ Pavan K. Varma, *The Great Indian Middle Class*,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India, 1998, p. 124.

子因此获得了经济上的成功，成为新兴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且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前赴后继地加入中产阶级大军。正如学者阿拉文德·拉贾戈帕（Arvind Rajagopal）所言：“这个阶层越来越多地通过文化和消费主义形式的身份来定义自己，而与国家的认同则越来越少。”^①毋庸置疑，部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会淡化社会批判者的角色，转而关注个人和家庭的福祉，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仍有部分知识分子坚守改革者与批判者的角色：他们参与了大量的经济研究和政策建议工作，通过研究改革的效果，分析经济数据，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决策支持。面对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变迁，以及经济现代性带来的经济不平等、科技伦理挑战、文化冲突、人的异化疏离等问题，知识分子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引领和批判的作用。他们通过文学、电影、新闻和社会活动等多种方式，探讨经济改革对社会结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的影响。自印度独立后，印度文学界便不断涌入各行各业的跨界知识分子，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圈内出现一批曾有过经济学背景的知识分子，如曾在牛津大学与斯坦福大学攻读经济学的赛特，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获得机械工程学士学位的商业小说鼻祖巴哈特，从旁遮普大学获得经济学学位的塔伦·特杰帕尔（Tarun Tejpal）。这些知识分子利用他们的经济学背景，在文学作品中探讨了社会经济问题，批判和反映经济体制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拓展了印度文学的深度和广度。

以巴哈特、阿迪加、特杰帕尔为代表的新一代小说家更多地介入现实，以他们从事银行业、经济杂志记者时探查到的社会现状为蓝本，书写经济现代性导致的自主性困境。巴哈特的《五点人》根据自己就读于印度理工学院的经历写就，探究科技至上价值观下知识分子的异化。经济现代性逐渐抹除了现代性的政治意义，使得自主主体成为一种幻象。小说的三位主人公——哈里、瑞安和阿洛克——来自不同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就读于印度理工学院，深陷在资本主义教育体制所造成的竞争压力中。这一体制秉承了功利主义思想，将学生视为生产力的工具，“高绩点”成为唯一的价值标准，个人的知识追求被功利化为一种为未来职业和经济回报服务的手段。三位主角通过作弊、抄袭等手段试图逃避学术压力，巴哈特借此揭示了资本主义教育体系如何摧毁个体对知识的追求。三位主人公最终选择共同参与开发润滑剂创新项目以求得顺利毕业，虽然他们无法完全实现自主性，但通过

^① Arvind Rajagopal, “The Emergency as Prehistory of the New Indian Middle Class”, *Modern Asian Studies*, Vol. 45, No. 5, 2011, p. 1003.

创新突破既有的束缚，他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成就。巴哈特通过这些人物的选择，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在资本主义教育体制中找到生存之道，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异化与妥协。

阿迪加的布克奖获奖作品《白老虎》（*The White Tiger*, 2008）则以贫富差异和阶级固化为主题，反思知识分子面对不公与腐败现象等种种现代性发展危机时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所面临的道德与伦理的困境。虽然经济自由主义催生了印度近1亿的中产阶级，其消费水平、生活质量有着明显提高，但自由化改革通过“滴流”和扶贫惠及下层群众取得的效果却十分微小，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没有得到实际改善。^① 私营经济的管制、最高资产封顶的被取消，使得印度经济愈发偏向资本主义模式，进一步加剧了阶级固化和贫富差距。小说中的国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阿肖克目睹了底层人民的苦难，良心受到谴责。尽管他对社会不公状况有所反思，并对自己的生活方式产生厌倦，但他却缺乏改变的勇气。在现实的压力下，他选择与腐败官僚同流合污，为自己的前程谋取利益。米斯特里在《微妙的平衡》中刻画了瓦尔米克这样一位对印度新自由资本主义体制进行深刻反思的知识分子形象。瓦尔米克曾是《印度时报》的校对员，他每天面对的是“国会成员在缓解旱灾计划中牟利”“腐败”“经济危机”等问题的报道，^② 一开始，他还能通过压抑情感来继续工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意识到，尽管经济自由化带来了表面的繁荣，但对贫困阶层的帮助却微乎其微。瓦尔米克起初梦想通过开设企业、投身商业来寻求个人的成功和突破，但他越来越感到这种自我追求只会使自己愈发麻木，无法逃脱资本主义对个人命运的控制。最终，他选择回归律师职业，为那些被剥夺的群体发声，这体现出他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体制的深刻反思与道德觉醒。

特杰帕尔则在呈现问题的复杂性时给出了积极的建构策略。在《我的刺客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Assassins*, 2007）中，他从一个调查记者的视角书写被印度经济发展排除在外的底层人民的故事，揭露自由主义经济之下繁华都市的乌托邦假象，强调在基层建立强有力的社区组织，促进小企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切实地从底层视角出发，努力克服知识分子的阶级局限性。历史学家戴维·卢登（David Ludden）将印度的经济现代性称之为“帝国现代性”，国家“把赌注押在富人身上”，以确保经济增长，资本以多种形式向上流动，汇聚到精英手中。

① 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90—591页。

② 罗因顿·米斯特里著，王晓东、宁美译：《微妙的平衡》，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268—269页。

20 世纪 80 年代，上层社会——那些从大英帝国的地位和印度国家发展的帝国政权中获益最多的人——推动政府回归自由市场体制，彼时这种体制已经不再与帝国联系在一起，而是与进步、自豪的印度人联系在一起。^① 底层人民则沦落为经济发展的边缘，成为成全印度整体现代性的牺牲品。特杰帕尔本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揭示底层人民如何被国家经济政策剥夺主体性，批判经济不公，撕破自由主义经济面纱之下繁华都市的乌托邦假象，书写其中掩藏的丑陋与不堪。

四、文学知识分子与认知现代性： 印度“理性”之路的探索者

“理性”是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打下的另一个烙印。19 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孔德对实证主义和启蒙科学的倡导、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与穆勒的自由主义思想催生了印度的“世俗主义或理性主义”浪潮。^②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杰出的印度知识分子不间断地致力于对欧洲启蒙运动遗留在印度的知识和制度遗产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评估。从阿希斯·南迪 (Ashis Nandy)、微依那·达斯 (Veena Das)、比库·帕雷赫 (Bhikhu Parekh) 等“甘地主义知识分子”，到 20 世纪 80 年代借助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哲学之力的批评家，批评界愈发质疑启蒙理性主义和进步 / 解放这一元叙事，警惕殖民者的实践和知识体系对印度新主体性的形成产生的影响。^③ 以阿马蒂亚·森 (Amartya Sen) 和阿迪蒂亚·慕克吉 (Aditya Mukherjee) 为代表的印度知识分子质疑起源于欧洲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的理性和世俗现代性，试图回溯欧洲启蒙运动开始之前的非欧洲文明，探寻别样的世俗理性价值，构建本民族的认知现代性。^④ 印度英语文学家也以小说创作的形式，加入对印度教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理性主义之间互动关系的探索之中，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① David Ludden, “Imperial Modernity: History and Global Inequity in Rising Asi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3, No. 4, 2012, p. 593.

^② C. A. Bayly, *Recovering Liberties Indian Thought in the Age of Liberalism and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7.

^③ Dipesh Chakrabarty, “Modernity and Ethnicity in India”, *South Asia: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Vol. 17, Special Issue, 1994, p. 143.

^④ Hulas Singh, *Rise of Reaso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19th Century Maharashtra*, Abing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 24.

为印度寻找未来的“理性”之路提供了方向。

印度独立前夕，英国殖民者竭力在印度各民族、各教派、各党派之间进行挑拨离间，制造分裂。虽然尼赫鲁倡导的超宗教现代性以及甘地的折中主义宗教观调和着印穆冲突，^① 却仍无法阻止悲剧的发生。1947年的印巴分治在印度历史上留下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疤，自1956年第一部印度英语分治小说《火车开往巴基斯坦》（*Train to Pakistan*）出版后，不断有作家在小说中回溯分治事件，如马诺哈尔·马尔贡卡（Manohar Malgonkar）的《恒河弯道》（*A Bend in the Ganges*, 1964）、杰曼·纳哈尔（Chaman Nahal）的《自由》（*Azadi*, 1975）等。分治文学的长盛不衰，体现了印度英语小说家们对分治事件以及印穆问题的深刻反思。他们将历史记忆与个人记忆相结合，既剖析了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对于印穆问题的复杂看法，又以多重视角展现了这一事件对印度的深远影响，同时还尝试给出了建构印度理性主义现代性的可能策略与构想。

1961年，印度第一部以穆斯林知识分子视角书写印巴分治的英文小说《破碎柱子上的阳光》（*Sunlight on a Broken Column*）出版。作者阿提亚·侯赛因（Attia Hosain）在文中刻画了一个复杂、异质的穆斯林知识分子群体：阿萨德相信印穆冲突是由英国人挑起的，他们让印度教徒和穆斯林自相残杀，然后出面用秩序和法律阻止，以彰显印度尚未达到自治的条件；西塔及其家人是国大党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坚定支持者，为国家自由而战；纳迪拉坚决捍卫穆斯林传统；萨利姆认为国大党一定会在独立后一家独大，报复穆斯林对印度教徒百来年的统治，分治后留在印度只会遭受怀疑、偏见与仇恨，不如支持分治，建立属于穆斯林的国家。侯赛因让这些知识分子通过论辩的方式，给出每一种观点背后的理由，而他们谁也无法说服对方，侧面表现出印穆问题的复杂性。这群知识分子也各自作出了不同的抉择，以多种方式建构印度的现代性，这也是作家本人给出的种种策略构想。分治发生后，扎赫拉选择在穷人和难民之间工作，从那些亲历者口中听到种种真相，更明白了传承穆斯林文化和语言的重要性；埃米尔把每个弱者的事业都当作自己的事业，把每一次革命都当作圣战；阿萨德则放弃了继续在德里从事教育工作，加入国大党，从事政治工作，谋求妥善解决印穆问题。

20世纪90年代，印度教民族主义激进分子强拆了位于印度北方邦圣城阿约迪亚的巴布里清真寺，要在其上建立印度教罗摩庙，这次

^① Pavan K. Varma, *The Great Indian Middle Class*, New Delhi: Penguin Books India, 1998, p. 19.

拆寺事件引发了印度国内自独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印穆教派骚乱。^①随后，支持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一跃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逐渐成为印度政治舞台上的关键角色。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再次兴起早在英·甘地执政时期便初见端倪。为了获得高支持率，英·甘地向印度教多数派寻求支持，实则间接认可了教派身份。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英·甘地利用印度教徒对阿萨姆、克什米尔、旁遮普等地分离势力的恐惧，以达到暂时的政治目的，这加剧了印度教徒与非印度教徒之间的紧张关系。经济竞争的加剧也是促成教派冲突的原因之一。资源缺乏和容纳力有限，人们的活动能力有别，造成了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不均，当不平衡出现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教派之间，就极易被教派主义分子利用，挑起教派怨仇。

1984年，英·甘地被锡克教徒刺杀，随之而来的是锡克教徒遭到大肆报复，教派纷争日益激化。女权主义活动家梅农·丽图（Menon Ritu）和卡姆拉·巴辛（Kamla Bhasin）在其分治研究著作《边界与疆界：印度分治中的女性》（*Borders & Boundaries. Women in India's Partition*, 1998）中对英·甘地遇袭一事有如下反思：

困惑和震惊攫住了我们，对所发生之事的可怕认知驱散了虚假的安全感。那些曾经历过精心策划的愤怒与暴力的人以为一切终成过去，然而，分治的阴霾再次笼罩……在那几天、几周、几月里试图接受这一切悲剧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再也无法把分治看作发生在另一个国家的事，看作可被埋藏的过去。的确，如果不回顾分治事件，不挖掘尘封的记忆，不探查历史，我们似乎很难理解目前正在发生着的一切。^②

在此背景下，知识界再次掀起了反思分治事件的浪潮。一批出版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印度英语小说，如拉什迪的《午夜之子》和《撒旦诗篇》（*The Satanic Verses*, 1988）、安妮塔·德赛（Anita Desai）的《白日悠光》（*Clear Light of Day*, 1980）、赛特的《如意郎君》、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的《阴影线》（*The Shadow Lines*, 1988）、古尔恰兰·达斯（Gurcharan Das）的《一个美好家庭》（*A Fine Family*, 1990）均以分治为写作背景。较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分治小说，

^① 陈小萍：《印度教民族主义与独立后印度政治发展研究》，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② Menon Ritu and Kamla Bhasin, *Borders & Boundaries: Women in India's Partition*, New Delhi: Pauls Press, 1998, p. xi.

这批新小说呈现出追根溯源之势，多数关注到英殖民时期印度教民族主义最初的形态，以及在培养印度教民族主义精神的过程中生产出的女性知识分子。例如，德赛的《白日悠光》以比姆这一女性知识分子形象为核心，揭示了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女性在分治背景下的能动性。比姆选择终身不婚，承担起照顾患有精神障碍的弟弟以及米拉姑妈的责任，但她并非囿于男性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对女性的建构——为了迎合现代性的要求，他们主张提升女性地位、推行女性教育，试图将以女性为代表的“家”作为印度民族精神的核心，构建出优于西方的民族形象。比姆选择独立生活并从事教育工作，重新定义了家庭与女性的角色，体现了她在认知现代性框架下的理性与自主性。这一时期，很多女性主义学者也纷纷著书立说，除了前面提到的丽图和巴辛外，还有乌瓦什·布塔利亚（Urvashi Butalia）的《沉默的另一面：印度分治之声》（*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Voices from the Partition of India*, 2000）以及拉迪卡·莫汉拉姆（Radhika Mohanram）主编的《分治与余生：暴力、记忆、生活》（*Partitions and Their Afterlives: Violence, Memories, Living*, 2019）。她们多采用访谈、田野调查的方式揭露分治带给女性的巨大苦难与创伤，侧重于女性遭受的暴力、强奸、裸体游行和绑架等恶行。不同于将关注点集中于女性难民的女性主义研究，印度英语小说致力于挖掘隐藏在官方历史建构的话语之下或许未受到分治暴力直接影响的中产阶级女性知识分子。这些女性知识分子并未完全屈从于传统宗教观念，即那些根深蒂固的宗教教义和文化规范，这些观念通常将女性限定在家庭内部的母性角色上。她们在科学、理性与宗教之间进行对话，寻求个人独立与社会进步。

过去几十年间，印度知识分子不间断地对欧洲启蒙运动遗留在印度的知识和制度遗产进行批判性的重新评估，对西方现代性所强调的“理性”发出质疑，并结合印度本土宗教文化，试图探寻独特的印度理性主义，而20世纪90年代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复兴也给知识分子敲响了警钟，告诫他们必须辩证地对待印度人的宗教情感。印度英语小说并不局限于反思印度教民族主义造成的后果，而是致力于通过作品呈现出种种可能性，探讨应对教派冲突的可能策略，推进印度理性主义现代性的建构。赛特的《如意郎君》便通过构想布拉姆布尔市这样一个完全超越宗教情感的共同体，再现了尼赫鲁所倡导的世俗国家的建构理想。然而，小说借助知识分子人物，如卡普尔、阿加瓦尔、查特吉法官等官僚知识分子展现了更为复杂的现实。一方面，他们推崇科学与理性，主张宗教宽容；另一方面，他们又借助宗教拉拢人心、

赢得选举。小说揭示了尼赫鲁式世俗国家理想的局限性，质疑这一理想是否依旧局限于中产阶级的印度教框架之中。达斯的《一个美好家庭》刻画了对教派冲突态度各异的各色知识分子形象：普丽蒂是狂热的宗教信徒，阿琼相信积极的社会工作才能最大限度地赋予人生意义，而宗教是对现实生活的逃避。包吉虽是忠诚的印度教徒，却也同时崇尚务实的现实主义，是自由价值观的捍卫者。通过这些人物的对话与冲突，小说呈现了不同知识分子对印度“理性”的理解，挑战了单一的现代性话语。

2001年，印度人民党正式开始实施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计划，全国教育研究和训练委员会开始删改历史教科书。遭遇删改历史教科书的作者都是印度国内知名的历史学家，他们纷纷站出来指责政府的这一行为。如罗米拉·塔帕尔（Romila Thapar）认为印度人民党删改历史教科书是为了在公立学校落实印度教特性思想，实质上是以历史知识掩盖因家族掀起的宗教狂潮。^①阿比达·萨达尔（Arpita Sardar）的小说《在围困时代》（*In Times of Siege*, 2004）便还原了这一事件，主人公希夫是处于风口浪尖的历史学家，他编写的历史教材因伤害了印度教徒的情感而被删改、扭曲。希夫和学院的穆斯林秘书都是极端宗教主义的受害者，但他们却彼此厌恶，无法达成共识。最终，希夫决定继承父亲的自由主义斗士衣钵，坚守知识分子的良心，致力于构建印度的理性主义现代性。戴维·戴维德尔（David Davidar）所著的《帝王的孤独》（*The Solitude of Emperors*, 2007）刻画了记者维贾伊、报刊创始人索拉布吉先生等知识分子形象，书写了这几位人物从置身事外到不惜牺牲生命去阻止宗教冲突的转变过程。戴维德尔借助小说中索拉布吉先生的书稿，倡导当代印度青年以主张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历史伟人，如阿育王、阿克巴皇帝以及圣雄甘地为榜样，鉴往知来，在“理性”与“宗教”之间找到一条多元、流动的“印度理性”之路。

五、结语

纵观印度知识分子领导民族独立运动、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两个世纪的历史，建构印度现代性是他们一以贯之的目标。自殖民时代起，印度知识分子便深谙自由、民主、理性和进步思想的重要性，但

^① 陈小萍：《印度教民族主义与独立后印度政治发展研究》，时事出版社2015年版，第159页。

也不是一味地奉之为圭臬，而是谨慎调和印度本土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性意涵之间的矛盾冲突，力求达成一种妥善的平衡。独立后的印度建立了世俗的民主国家，采取混合式经济模式，意在不脱离国情的基础上建构有别于西方的现代性。在政治上，知识分子群体曾是印度现代性的设计师，推动了印度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确立了现代民主政权。印度独立后，他们或被动或主动地退出政治舞台，转而更多地承担起批判者的角色，审视印度在民主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这种批判并没有局限在对现代性问题的讨论中，也有对知识分子自身局限性的反思。在许多印度英语小说家的作品中，我们都可窥见他们对自身种姓、阶级、性别特权的省思。在经济上，印度早期偏向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已在自由化改革政策的影响下向资本主义经济靠拢。事实上，这种资本主义倾向一直存在，并且已经引发了贫富差异加大、阶级固化、价值观扭曲等社会问题，这正是印度知识分子建构经济现代性所要解决的问题。在认知领域内，印度虽以世俗主义建国，但无论是政党政策还是社群关系都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如何在西方“理性”与印度宗教之间达成平衡，一直是印度知识分子建构现代性的难题，从印巴分治到甘地被印度教顽固教徒刺杀，再到英·甘地被锡克教原教旨主义分子杀害及20世纪90年代巴布里清真寺被毁，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一直处于上升状态，宗教极端主义造成的悲剧比比皆是，可见印度知识分子构建理性主义现代性仍是任重而道远。之所以要梳理自19世纪以来印度知识分子与印度现代性建构之间关系的演变，以及各个时期的印度英语文学家在小说中描摹的处于印度现代性建构进程中的知识分子画像，是为反思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性，并评估他们所设想的现代性建构策略做好铺垫。

[责任编辑：王国平]